

# 《红与黑》重译复译现象分析

马海艳(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6)

**【摘要】**法国作家司丹达尔(一译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中国后备受关注,其在中国的翻译越来越繁荣,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翻译热潮。《红与黑》重译复译现象极为特别。本篇论文考察《红与黑》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分析《红与黑》主要译本的特点,探寻《红与黑》翻译热背后的原因及重译复译之中隐藏的问题,藉此希望之后的重译复译不仅必要、合理而且能够后来居上。

**【关键词】**《红与黑》;重译;复译

某一作品以某一语种的语言被首次翻译出来是首译,首译之后再重复翻译就是复译。同一翻译家对已译过的作品的重新翻译则为重译。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外国文学名著几乎都有复译本,少则两三个,多则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一些名作也有重译本。《红与黑》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就有上百个,其重译本也不下数十个。

## 一、《红与黑》的翻译

### 1、第一个中文译本

首先把《红与黑》翻译过来的是赵瑞蕻,他将其节译成《红与黑》第1分册由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初版。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又出版了赵瑞蕻译的《红与黑》。该译本对旧译进行了校对、修改,也增译了一些篇章。赵瑞蕻的译本虽都是节译,但他却是《红与黑》汉译第一人,其译本“信实而流畅,通达而明白,保留了原作的风格”,且洋溢着浪漫情调,描写精彩而富有诗意。

1949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了罗玉君据法文译出的《红与黑》(上册)。同年,罗玉君译的《红与黑》(上、下册)也由正中书局出版。《红与黑》才以完整的面貌在中国公众中流传开来。

### 2、《红与黑》的热译

罗玉君译本一本独行。1949-1985年,《红与黑》的全译本只有一部,译者是罗玉君。因此,在1986年之前的近40年间只有罗玉君的一个全译本在流传。

复译重译的繁荣。80年代中期我国掀起了《红与黑》翻译热潮。1986年郝运译本出现后,《红与黑》的翻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6-1996年这10年间,《红与黑》译本骤然增多,全译本译者有郝运、闻家驷、张冠尧、许渊冲、郭宏安、罗新璋、杨德庆、赵琪、青青、刘志威。1997年后,越来越多的译者加入其翻译阵容中来,复译重译屡见不鲜,高离、张朝栋、王士元、王伟强、夏雨等不断对其进行重译。

出版社竞相出版。《红与黑》复译本的出现、旧译本的重印和再版以及改译本、缩写本的出现,让一些出版界人士叹为观止。如郝运译本就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995、2001、200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几乎每家出版社都想推出自己的《红与黑》,有的出版社则推出几个译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88年起推出了张冠尧和闻家驷译本。《红与黑》的改译本、插图本、连环画、漫画本等也不断涌现。

《红与黑》几乎是我国复译最多的一部法国小说了。在中国翻译史上,汉译《红与黑》是一件大事,且在译本数量上,只有中译莎剧堪与之相提并论。

### 二、《红与黑》主要译本分析

《红与黑》的主要译者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闻家驷、张冠尧、郭宏安、许渊冲和罗新璋。由于对翻译的认识不同,主张各异,在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译文也就各具特色。罗玉君译本以信为本,偏向原作,欧化倾向明显;郝运译本则忠实于原作,比较贴近原文,带有些许欧味;郭宏安力求再现原作风格,罗新璋力求给原作以艺术生命;许渊冲则主张发挥汉语优势,进行再创创作。不同风格的译作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的不同选择和需求,并且不同译本可以相互映衬、长短互显,让译者在对比和竞赛中提高翻译水平。

在已有罗玉君这个特别有影响的译本的情况下,后译者

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复译和如何对待前译。前译的不足是后译者复译的最根本原因。郝运觉得罗玉君译本仍有许多错误和欠妥的地方,郭宏安则不满于郝运译本字句过于质木,太少灵气,不够精炼。许渊冲认为新译应尽可能高于旧译,至少不能明显低于旧译,但他的超越也是在前译的基础上试图有所突破和进步。他在翻译中就参考了不少旧译,“甚至把旧译当自己的初稿,总要改得自己认为胜过了旧译文,才算对得起读者”。在翻译态度上,他们无不认真而严谨,在翻译中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和精力。赵瑞蕻主张翻译需要长期积累,耐心探索,他还勇于自我解剖,指出已译中的错误。因此,他不仅为读者奉献了富有特色的译本,同时还“以高尚的‘译德’影响着后来的译者。”郝运则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去译。翻译《红与黑》是郭宏安1963年起就藏在心底的夙愿,翻译中则“自设藩篱,遁迹而行”。许渊冲为使译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大胆而不懈地追求,尽管他的译论遭到质疑,他的译事也被否定。罗新璋更是为了使译文“精彩”而“朝译夕改,孜孜两年”。

### 三、《红与黑》翻译热潮

复译的层出不穷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特别是1990年后,我国出现了外国文学名著复译热潮,《红与黑》就是这股复译风潮的代表。

#### 1、历史政治因素

现实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行推动了《红与黑》的翻译。建国初期,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文学界推行“现实主义至上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批判社会反动势力、讴歌社会进步力量的作品被大量翻译。这种形势下,《红与黑》的译者也就获得了某种依据或合法地位。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红与黑》受到很大的关注。反右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加大批判,而“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往往被说成是受了《红与黑》的影响,《红与黑》成了“个人主义”的典范。这期间《红与黑》虽是批判的对象,但批判与阅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就不断被再版和重印。

文革期间,《红与黑》的翻译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许多文学上的禁区被冲破,外国文学作品纷纷被译介过来。当时唯一的《红与黑》全译本在短短几年内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而郝运译本问世后就吸引了迫切需求文化营养滋润的读者,因此发行量特大、流传面极广,经多次印刷,数量也不低于百万册。今天看来,罗玉君及郝运译本的百万册销量无异于是天文数字。除因文化荒芜而带来的出版热潮外,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推动因素。

#### 2、社会学因素

版权保护法的推行。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后,外国文艺作品的输入受到版权的限制,不少出版社就把翻译目标指向了不受版权保护的外国古典名著,掀起了一场复译热潮。1993-1997年短短三四年间就有近十个《红与黑》译本问世。

中国出版体制的改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各出版社在版权法的推动下,必须自己出版作品、出版自己的作品。一些出版社只好组织新人新译或是旧译再版。《红与黑》译本中就有了许多新手的译作。

名著效应。为了让国人接受,译者采取了《红与黑》是“名著”的翻译策略。《红与黑》被视作世界文学名著,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等翻译出版。赵瑞蕻1947年的译本是作为



的姐姐也去世了, 16岁时唯一的亲人祖父亦离开了他, 青年时代又遭遇了爱情的致命打击, 还经历了关东大地震的惨烈, 又参加了三岛由纪夫、横光利一、岛崎藤村、北条民雄等数位文艺界名人的葬礼, 表嫂说他简直像殡仪馆的人, 表妹甚至说他的衣服有一股坟墓味儿。他自幼经历承载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也促成了他与佛学的亲近。在数不清的举行葬礼的日子里, 对生命延续的渴求, 对死亡意识的克服, 以及超越死亡的渴望日益强烈, 成为川端文学生涯中的一大精神课题, 而佛教的核心理论——正是对死亡和思考。从川端踏上文学道路开始, 佛教就作为一种关于死亡的思想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和创作, 在中学时代, 无数次投稿石沉大海后, 在1916年作为中学四年级生, 在《困弈》杂志上发表了以英语老师苍先生的死为线索的习作小说《肩扛恩师的灵柩》, 从此他就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从处女作以来, 川端文学一直贯穿着或明或暗的死亡主题和佛学思想的投影。有人说死亡是文学作品的终点, 而死亡却是川端文学作品的起点, 尽管川端极少对死亡的现象和过程进行直接描写, 但几乎所有作品都带有死亡的气息或痕迹。据林武志的《川端文学研究》所载“川端的第一套合集中, 有34篇作品, 在开篇5行之内就出现了与死亡间接或直接相关的话语, 几乎占到了合集作品的三分之一。而《参加葬礼的名人》、《尸体介绍人》、《殉情》、《抒情歌》、《禽兽》、《末期的眼》等从散文到小说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以死亡问题为中心的。”

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盛阴。前四种为肉体上, 生理上的苦, 后四种是精神上, 心理上的苦。对于这些苦, 川端几乎都有深切体会, 为他走向佛学, 寻求超越奠定了心理基础。家庭经历和社会经历共同合作为艺术创造主体的川端带来了深厚的经验积累和丰富的精神感受。前者赋予了他有关死亡和无常的感性体验, 一种沉溺其中的切身感受和近距离的直观印象; 后者则进一步促成他有关死亡和无常的理性认识, 是一种保持适度距离的冷静旁观和客观因素。所经历的一切使他深切的感受到世事无常, 实难预料。为此他写下了《非常》《南方之火》《她的盛装》《海之火祭》等一系列作品。

佛教《涅槃经》云:“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所有事物的运行都是无常变化的, 有生就有死, 有死就有生。而只有有了生与死的概念, 才会感到所有事物的无常生灭; 如果没有生与死的分别, 就不会感到诸行无常了。芸芸众生都是无常的, 转瞬即变, 可一切生灭都

要放下, 要彻底灭掉。所谓“生灭”即抛开一切, 包括生死问题。抛开了生灭便可以进入寂灭入定的境界, 即没有了苦乐的境界, 从而永离诸苦, 只受安乐。在《雪国》中作为完美化生的叶子最后坠身于一场大火, 完成了凤凰的涅槃, 进入了无上妙乐的极乐世界; 在《化妆与口笛》中描写过“死的秘密的纯洁”; 在《临终的眼》中写道:“冰一样透明是死的世界”; 在《绿色的海, 黑色的海》中写过“平稳如镜的海般的死”……川端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贯穿了“死的美, 死的快乐”的思绪。

而川端在参加许多日本文艺界名人的葬礼后, 也选择了口含煤气管不留下任何遗书的自杀。他说过:“自杀而无遗书, 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痛, 就是无限的活。”他还说过:“我又现实, 既不想懂懂, 也无意接近, 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也许其他任何自杀方式都不及煤气这“虚无”的气体更能把他带到“虚幻的梦境。”

有人说, 自然地面对死亡, 甚至于欣赏死亡, 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征。日本人之所以把樱花作为他们的精神象征或偶像, 一是因为樱花只有漫山遍野的开放时才最美丽, 这代表了他们那种团结的精神;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樱花的花期特别短, 在极尽声色的绽放之后就凋谢了, 再灿烂地迅速死去。有人说川端在他视为接班人的三岛自杀后, 继《千纸鹤》《古都》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有种感到江郎才尽的痛苦, 而选择了自杀的, 在《临终的眼》中说过:“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 死就是生。”佛学融入了川端的生命, 进入了他的文学, 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佛学的痕迹, 佛学的思想, 佛学的精神。

#### 【参考文献】

- [1] 叶渭渠主编. 川端康成文集(全10卷)[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6.
- [2] 杨增文著. 佛教的起源[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89.
- [3] 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法师合撰. 《祖堂集》卷2《第二十祖菩提达摩和尚》.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3.
- [4] 叶渭渠译. 川端康成散文(上下册)[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 [5] 周 阅著. 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长谷川泉著. 日本文学论著选·川端康成论[M]. 孟庆枢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 [7] 叶渭渠著. 冷艳女士川端康成传[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6.
- [8] 任继愈主编. 宗教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第4种翻译出版的。这种翻译策略满足了读者赶上世界文学潮流的心理需求。

我国教育方针的制定。《红与黑》被作为大学生必读、中学生课外名著阅读推荐图书推出, 由此产生了许多译本。张冠尧译本就可作为大学生必读推出的。

除不可避免的市场原因外, 正如郭宏安所说:“翻译热潮还与翻译事业的进步、翻译观念的演变和翻译人才的成长等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 而社会语言的演变, 读者欣赏趣味的改变, 译者接受挑战的欲望等也是促成这股热潮的因素。”

#### 四、繁荣背后的危机

看似十分繁荣的《红与黑》翻译背后, 却存在不少问题。在见利忘义思想的冲击下, 剽窃、抄袭之作纷纷出笼。不少译者对待翻译很不严肃, 译文低劣, 量的繁荣隐藏着质的下降。1986年后, 《红与黑》译者阵容庞大, 年轻译者成为主力, 其中不乏优秀的, 但更多的却非常稚嫩, 再加之急功近利, 许多新手的译作只能昙花一现。

《红与黑》复译重译的大量出现也给某些译者提供了抄袭条件。一些人将已有的译本稍作改动, 便以新译出版。一些小出版社为名利所驱, 请一些新手当翻译, 结果只能剽窃已有的译本, 《红与黑》就有多种这样的译本。赵瑞燕在“《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话”(《文汇报》1995年4月1日)中明确指出:“个别本子竟有抄译的现象, 就是抄郝远的译本, 许多地方一句一句, 一行一行地抄, 有时只改动几个字。”如海南出版社、署名亦青、赵琪的译本。姜燕译本

的译按则原封不动地把罗新璋个人的翻译体会抄写了下来。还有一些出版社的译本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这些问题的出现, 除译者和出版社应采取严肃态度外, 出版部门还应加强对翻译出版物版权市场的管理。

那些抄袭、剽窃以及不负责任、粗制滥造的译本, 并不能掩盖那些把文学翻译视为生命的译者的优秀译作。这些译者不仅严肃地对待翻译事业, 还能在复译热潮中保持严肃的翻译态度。正如赵瑞燕所说“译书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数辈译者的努力, “日的只有一个: 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 当然, 最好的情况是, 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 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

一部作品有众多译本, 不断被重译复译, 正是其独特价值的体现。也正是这种价值吸引着不同的译者, 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译本, 从而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更好的平台。

#### 【参考文献】

- [1]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 [2] 孟昭毅, 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 许渊冲. 从《红与黑》谈起[N]. 文汇报, 1995-5-6.
- [4] 许 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5] 郭宏安. 雪泥鸿爪[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6] 斯丹达尔. 红与黑[M]. 罗新璋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